

当代问题

张彦华 | 作者张彦华博士为旅韩中国政治学者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教会的抗争：基督教会与韩国民主转型

摘要：基督教在韩国民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之前的研究更关注于基督教作为文化和信仰支撑所发挥的间接作用。本文侧重于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直接参与抗争的方式所发挥的作用，并认为韩国基督教会是推动该国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为论证此观点，本文从韩国教会为何抗争和如何抗争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历史反省、现实状况和民众神学阐述了教会抗争的合法性，并从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三个方面论述了教会在抗争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

引言

韩国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一个典型，许多学者对韩国的民主转型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基督教在韩国民主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考察基督教与韩国民主转型的关系时认为，“基督教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¹ 韩国学者任成彬指出，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对韩国民主转型具有重要的作用；² 中国学者尹保云指出，韩国的本土文化受到了西方基督教影响下的民主思想的冲击，最终促使基督教文化发展壮大，这对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起到了推动作用。³ 从这些研究的切入点来看，他们认为基督教的主要作用在于培育公民社会和传播平等、自由等现代文化。换句话说，基督教主要是以间接的方式，从文化和信仰支撑的角度对韩国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参与社会抗争的直接方式对韩国民主转型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而这正是本文分析的切入点。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直接方式参与社会抗争，从而对民主转型产生了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基督教会是推动韩国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吗？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会”，指的是韩国基督新教的地方教会、宣教会，神学院以及跨教会组织；所谓“主要力量”，指的是不仅仅担当行动背后的文化与信仰支撑角色，而且是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直接的抗争方式参加、甚至是民主转型进程的主导力量。本文的观点是：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威权统治最为严酷的朴正熙和全斗焕独裁政府时期，基督教会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在实际的抗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之一。

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部分：第一是何为抗争？第二是如何抗争？对教会来说，参与与领导社会抗争需要首先解决为何抗争的问题，即抗争需要有合法性。本文的观点是，进入1960年代后，韩国教会适逢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其中包括：教会对1950年代屈辱历史的反省；1960到1980年代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在城市创造出大量劳工、贫民等被边缘化民众；从1960年代开始萌芽，在1970年代成型的“民众神学”。对于如何抗争的问题，本文的观点是，教会在抗争过程中发挥了“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三重作用，而这三重作用是抗争理论所认为的能够成为主要力量需要具备的条件。

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

“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指的是为人们参加抗争提供机会的政治社会结构，包括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组织的出现、国家镇压抗争的限度、抗争的合法性程度等。⁴就韩国基督教会参与并领导社会

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历史反省、现实状况和民众神学。

1、历史反省

基督教在19世纪末进入韩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了当政者的压制，因为基督教所带来的“一神”思想、平等观念和反抗意识不利于其王朝的统治，但是迫害并没有阻止基督教在韩国的早期传播。1910年到1945年间，日本将朝鲜半岛作为其殖民地，全面推行殖民侵略政策。基督教与韩国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成为韩国民族主义者实现民族独立、反抗日本侵略的武器。韩国基督教会在日本殖民时期参与的最著名的运动，是1919年的“三·一运动”。

1948年韩国建国后，基督教和当时的李承晚政权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其主要原因是李承晚是一位长期在教会服侍的监会长老，虽然在其任内实行独裁统治，但基督教整体上与李承晚政府保持紧密的合作，基督教思想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继高丽王朝的佛教和朝鲜王朝的儒教之后新的统治思想。⁵

1960年4月19日，韩国爆发了反对李承晚独裁政权的学生大游行，李承晚被迫下台，教会一度被全社会所嫌弃，而这迫使教会对自身的社会定位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经历过李承晚政府时期的全面保守后，韩国基督教会在朴正熙军人政权时期分化成了保守和进步两派。保守的基督教会配合军人政权，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政策主张，认为民主不能操之过急。而进步的基督教会，通过反省李承晚时期教会的“失策”，重新抬起

了日据（日本统治殖民）时期的抗争传统，“主张‘世界的人类化和解放’，争取下层民众生存权的意志更为强烈”，⁶积极参加各种争取民权的游行示威活动。李承晚政府时期，教会在抗争方面的“落后”和之后的反省构成了教会得以介入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的一部分。

2、现实条件

1961年5月，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开启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朴正熙统治时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的第三共和国时期，二是197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的维新体制时期。贯穿朴正熙和全斗焕统治时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城市创造出了大量劳动条件恶劣的劳工阶级和大量城市贫民阶层，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为社会抗争提供了潜在的巨大力量，这是教会抗争得以展开的政治机遇结构的一个方面。

1970年代初期，劳工阶级开始发起劳工运动，特别是“全泰一自焚事件”⁷将劳工阶级所受的压迫推向了全社会，使其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基督教会从1960年代开始致力于对边缘群体的传教工作，但逐渐发现，若要成功传教，需要先解决边缘群体的生存和生活问题。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教授具海根（Hagen Koo）多年研究后发现：“工业化开始后，大量人口向工厂集中，而宣教团体，特别是城市工业宣教会就在工厂旁边建立宣教点，他们要想有效地宣教，就不得不面对工人们工作环境恶劣、工资低下、工作时间太长等问题。参与抗争、培训抗争骨干、组织抗争行动成了教会工作中摆脱不了的事项”。⁸

此外，1948年韩国建国时仿照美国建起的是一个民主的政治框架，虽

然此后民主崩溃，相继出现了李承晚的半民主文人政府、1960年代朴正熙的半民主军人政府和1970、1980年代的军人独裁政府，但威权政权的迫害有限度、有底线，这些现实条件构成了教会积极参与和领导抗争的政治机遇机构的另一部分。

3、民众神学

19世纪末西方宣教士进入朝鲜半岛后使用的是“倪维斯（John Livingstone Nevius）宣教法”，这种宣教法集中关注劳工阶层、底层群体和妇女儿童，这是后来韩国民众神学出现的一个历史基础。作为一种解放神学的“民众神学”，从1960年代开始萌芽，其体现就是试图将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引入教会语境。⁹1970年代初期，韩国神学家安炳茂发表了《民众与耶稣》、《国家、民族、教会》等神学著作，这标志着民众神学正式形成。民众神学认为耶稣也是暴政的受害者，因此他总是站在民众的一边，而民众也是在苦难中遇见了耶稣。这里的“民众”指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市中出现的大量边缘人群，包括工厂的工人和贫民窟的贫民等。民众神学号召教会要积极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为被压迫的民众争取权利，并在这个过程中宣教。1973年5月20日发布的“韩国基督徒的神学宣言”宣称，民众与历史的基督站在同一阵线，同受圣灵的感动。因此“所有教会的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都要站到受压迫的民众一边，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努力”。¹⁰可以说民众神学弥合了当时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各个宗派、各个教团间的差异和分歧，“为了民众的教会”成了当时包含天主教在内的大部分教会的共同声音。

神学观念的变更，为基督教会参与和主导社会抗争建立了合法性基础，这

是教会抗争得以深入和持续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机遇结构。民众神学为贫困民众的抗争提供了一个神学的基础，这不是神学院课堂上所教授的一种概念性的神学，而是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神学。1970年代初期，国务总理金钟泌发表讲话，引用《罗马书》十三章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并以此要求教会顺服，为政府镇压民主人权运动寻找借口。对此，教会发表联合声明，其中提到“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某个政权的忠诚不是一回事……维新政权违背了神的公义，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范围，对国民造成了权利侵害。在这种时候，基督教会作为神公义的代言人有义务站出来，对此提出批判，并要求改正。”¹¹这是民众神学非常形象化的一个表述。民众神学的主张是：“第一，所有教会的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都要站到被压迫的民众一边，为实现社会正义而努力；第二，朴正熙政权不要以法律和秩序为借口压制民众的声音；第三，立即终止恐怖的信息封锁，不要把神圣的军队变成打压学生和民众的工具。”¹²

教会在抗争中发挥的三重作用

基督教会在社会抗争中主要发挥了三重作用，分别是“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这三重作用决定了教会是社会抗争和民主转型中的主要力量。

1、居间联系

居间联系指“在此前没有联系的地方通过宣传和激活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新联系的建立会引起抗争发生重要变化，使得一些观念、实践和资源

得以四处流动。这些新的观念、实践和资源常常会使不同地点间的联系和协作变得方便”。¹³威权统治通过制度性的办法把社会各部门之间的联系隔断，因此社会抗争往往以单个单位而进行，如果这些个体的行动单位能够得到某个中间人的呼应，在多个单位间建立联系的桥梁，社会抗争才能发挥挑战威权政治的作用。在韩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担当这个中间人角色的便是教会，教会成员可以是学者、学生、工人、农民、公务员、企业主等各个阶层的人员，他们通过共同的平台可以建立各种联系。

教会以传教的热情着手发动边缘群体进行政治和社会参与，这是任何其它组织都很难做到的，教会的居间联系作用激活了边缘群体的参与热情。比如，1960年代后期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关注劳工生活，利用教会聚会的机会探讨民生问题、腐败问题、人权问题和言论自由问题，并开展进一步的行动。之后，基督教青年会分别活动在劳工、农民和学生中间的宣教组织开始逐渐促成各社会力量间的联合。1970年代初，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和促进下，各种边缘组织创建了“民主守护国民协议会”，这是韩国民间第一个全国性的抗争组织。¹⁴再比如，城市工业宣教会最初是在1971年组建的韩国特殊地域宣教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由韩国基督教长老会、韩国耶稣教长老会、韩国基督教浸礼会和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共同组成。城市工业宣教会主要关注劳工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工权益的保护等。在民主化运动中的劳工运动中，城市工业宣教会是实际的发动者和组织者。¹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工业宣教会的美籍牧师乔治·奥格尔(George E. Ogle)。奥格尔在美国主攻神学和劳工运动理论，1960年代成了城市工业宣教会的主要牧师。奥格尔牧师在1974年被韩国政府强制驱逐出境，其被驱逐的主要原因即在于其作为牧师长期以来参与各种抗争运动，违反了韩国对外国人的相关法律。此事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虽几经斡旋，未能取消

韩国政府对奥格尔的驱逐命令，但美国政府从此开始高度关注韩国劳工的人权状况。¹⁶在奥格尔的推动下，城市工业宣教活动对劳工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具海根教授的研究，1970-1974年间，城市工业宣教会约教育培训了4万名工人；1967-1978年间年，教育培养工会领导者2000-2500人。没有城市工业宣教会的背后推动，作为边缘群体的劳工的抗争（特别是女工的抗争）很难在全社会引起关注。¹⁷

2、认同改变

认同改变指的是“发动挑战的团体内部形成新的认同，这些挑战者团体之间的协调行动不仅让他们聚拢到一起，同时也展示出他们间具有的共性”。¹⁸在社会抗争过程中，各种抗争力量间的政治诉求能否达成一致，不同的抗争力量为了共同利益是否会做出让步和妥协，不同的抗争力量能否形成内部团结，这是决定其抗争效果的重要方面。在韩国的社会抗争中，基督教会成功地促成了学界、法律界、传媒界和宗教界（主要是新教各宗派，以及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大联合，建立了“联合国民运动”。该运动组织是基督教会在认同改变机制作用下，建立的抗争联盟。教会之所以能够发挥认同改变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其具有的特殊性：信徒并不局限于某一特殊阶层，正如其传福音是针对全体民众一样。所以无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等都能在教会的圣经学习和祷告中找到共同语言，教会是各种抗争力量间的最大公约数。

基督教会在认同改变机制作用下，推动抗争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事例，发生在1973年复活节联合礼拜上。朴行圭牧师因在礼拜会上发放主张民主化的声明书，而被以“内乱阴谋嫌疑”收监，并被判处2年监禁。以韩神大

学金在准教授为首的十多名教授联名请愿，要求释放朴行圭牧师，废除维新宪法。此事加速了教会参与民主化运动的步伐。梨花女子大学的教授们也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朴行圭牧师和被捕学生，保障言论自由。¹⁹以此为契机，基督教会领导者、基督教教授协议会、神学大学教授、基督教大学教授、天主教圣职人员、传媒界人士、法律界人士和学生们纷纷加入了此次营救活动中，教会成为了抵抗维新体制的最强有力的堡垒。当时的维新独裁政权，即朴正熙政府迫于民间社会的联合大反抗，在监禁朴行圭牧师十多天后，被迫释放，联合抗争取得了空前胜利。另外一个认同改变的例子是作为反维新运动的一环，1973年12月24日，基督教、天主教、学界、传媒界等为中心，发起了改宪请愿百万人大签名运动。这是各界联盟形成的一个例证。

3、社会利用

社会利用指的是“抗争过程中可供抗争组织利用的资源规模。其包括：抗争组织生存空间的大小；是否易于形成全国性组织；抗争组织与国际组织的联系程度；抗争组织领袖的品质（如组织领袖对威权政权和民主的认识程度、是否愿意分享权力等）”以及在物质资源上的动员能力。²⁰此外，“通过利用组织性的和制度性的优势发起运动，把某些非政治性的团体转变为政治行动者”也是社会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²¹

在抗争运动中，教会成为了民主力量开会、讨论的重要据点。教会作为抗争的组织具有其它社会组织所没有的优势：第一，无论什么样宗派的教会，所敬拜的是同一个神，所受的是同一个灵，所读的是同一本经。因此，各界人士都能在教会找到共同语言。教会作为各个阶层、各种群体的沟通管道，是

信任和友谊的网络，在教会的号召下，极易形成抗争联盟。第二，基督教信仰是世界性的，无论如何迫害，表面上的信仰自由没人敢剥夺，教会的礼拜被看作是“最后的集会”。教会较比其他社会组织，特别是政治性组织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威权时期，韩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受到了来自军人政权的强大压力，大部分社会组织以“容共”的嫌疑被强行解散，而基督教会则在宪法条文所标榜的“信仰自由”的庇护下和来自西方国家基督教会的关注下，得以继续存在，并保持了一定范围内的宗教活动。²²教会也正是利用了这个优势，在威权统治最严厉的时候，仍然可以通过礼拜聚会、祈祷聚会等教会生活最基本的集会形式，对基督信徒及大众形成影响。第三，教会领袖基本都是知识分子，一大批牧师是从西方民主国家留学归来的，有的直接是西方国家的人担任牧师，他们在西方国家浸染的民主思维，对引导抗争向促进民主化进程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依靠信徒的捐献，教会拥有资金、人员、建筑和设备，这是社会抗争可资利用的有形资源；在抗争运动中，教会成为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的重要据点。

以“东一纺织女性劳工抗争事件”为例：赵会顺牧师是在仁川女性劳工当中非常有名的女牧师，在众多的发生在仁川的劳工抗争事件中，赵会顺牧师都进行了积极的鼓动，是女性劳工进行劳动抗争的精神领袖。赵会顺牧师在一次教会礼拜上大声疾呼：“现在的基督教会应该抛弃保守传统，积极投身于人权和民主化运动中。耶稣在其生活的时代也是这样，为弱势群体祷告、安慰劳苦的人，基督教会为了维护劳工的权益应该将自己完全献上。”²³“东一纺织女性劳工抗争”事件之后，甚至有500多劳工在教会集会成立运动团体。²⁴1980年代要求调查光州事件真相的静坐、KBS-TV视听费拒付签名活动、举行揭露当局酷刑的报告会和对策会、改宪斗争记者见面会和6月抗争的核心组织“国民运动本部”成立大会等都是在教堂内举行

的。此外，教会抗争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国际联盟的形成。1970年代，分散在世界各国的基督徒和他们的教会联合起来，通过世界教会协议会（WCC）等国际性的教会机构对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援，特别是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支援。²⁵

结语

教会抗争首先需要建构自己的合法性，韩国教会抗争的合法性构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确立民众神学。教会为被压迫阶层的权益而抗争是该神学的核心要旨，抗争的信念体系使得基督教会的抗争具有了合法性，使得教会在动员和组织抗争行动时更加积极、目标更加明确。²⁶第二是接续日据时期的抗争传统，将威权下的抗争与殖民下的解放相提并论；第三是有效发挥宪法条文中“信仰自由”的规定。任何威权政权至少在形式上会标榜信仰自由，教会在此原则的保护下，对妨碍信仰自由的种种政府行为起而抗争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此外，韩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创造出大量贫困群体和边缘化群体；基督教在1970、1980年代的高速发展；学生抗争的激励等，这些不但使得教会抗争具有了合法性基础，而且也构成了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

在抗争过程中，教会充分发挥了“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的作用。教会的居间联系作用激活了边缘群体的参与热情；教会的认同改变作用弥合了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之间，以及基督教各宗派之间的矛盾，使它们在宣教和抗争两个方面建立了共同的认识基础；教会以其掌握的各种资源对劳工阶层等边缘群体的抗争提供了有效的支援。基督教教会组织、其领导者、动员的潜力、威权政权宪法条文所确保的信仰自

由、教会的世界性连接关系等，这些特点使得基督教会成为了处于威权统治以外的、能够动员起民众并对威权政权造成一定压力的社会抗争的堡垒，其天然的抗争优越性要远大于其它社会组织。韩国威权时期社会抗争得以持续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督教会作为抗争组织积极参与和领导了抗争形势的发展，基督教会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其它社会组织所不可替代的。²⁷

从抗争与宣教的实际关联性来看，196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期，教会抗争有一个不断增强的过程，正是在此过程中，信徒人数和神职人员数量不降反增。根据相关统计，1960年，韩国基督徒总数是119万多，占总人口约4.76%；1970年基督徒总数是220万多，占总人口6.29%，1975年基督徒总数是401.9万，教会数是16,089，神职人员数是22,483；1980年基督徒总数达到了718万多，占总人口的23.68%，神职人员总数是31,740。²⁸由此可见，基督教会在发挥抗争主要力量的过程中，其自身也不断壮大。这无疑给威权国家里的基督教会一个重要启示：**教会若按照圣经教导勇于彰显上帝的公义，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敢于站出来指责和抗争，其自身会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在带动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自身也会取得巨大的发展。**

注释.....

- 1 [美]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4页。
- 2 [韩] 任成彬：《关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思考——以现代化过程为中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2002年版，9辑，第243-245页。
- 3 尹保云：《民主与本土文化——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 4 [美] 查尔斯·蒂利：《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1-85页。
- 5 김용복, “해방후의 교회와 국가”, *국가권력과 기독교*, 서울:민중사, 1982,

pp.201-202.

- 6 郑继永: 《试析新教参与韩国政治的过程和特点》, 《当代韩国》2010年夏季号, 第12页。
- 7 1970年11月13日, 为了替首尔和平市场的两万多名被服厂劳工的非人待遇和恶劣的劳动条件讨回说法, 劳工运动家全泰一用自焚惊醒当局。
- 8 구해근, *한국 노동계급의 형성*, 서울: 창작과비평사, 2002, p.118.
- 9 [美] 胡斯托·L·冈萨雷斯: 《基督教史》(下卷), 赵城艺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第453-454页。
- 10 杨牧谷: 《复和神学与教会更新》, 种籽出版社1987年, 第89页。
- 11 이수연, “70년대의 반체제 목사들”, *신동아*, 1984년 9월호, p.180.
- 12 한국 기독교 협의회편, *기독교 연간*, 1972, p.302.
- 13 [美] 查尔斯·蒂利: 《抗争政治》, 李义中译, 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第39页。
- 14 오석홍, “대한민국 정치약사: 우리나라 행정체제의 정치적 여건변천”, *행정논총*, Vol.23, No.1, p.78.
- 15 조승현, “산업사회에서 교회선교의 공헌”, *기독교사상*, Vol.23, No.7, 1979, pp.42-53.
- 16 이상록, “1960-1970년대 조지 오글 목사의 도시산업선교 활동과 산업민주주의 구상”, *사이간 SAJ*, Vol.19, p.89.
- 17 구해근, *한국 노동계급의 형성*, 서울: 창작과비평사, 2002, p.180.
- 18 [美] 查尔斯·蒂利: 《抗争政治》, 李义中译, 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第48页。
- 19 이수연, “70년대의 반체제 목사들”, *신동아*, 1984년 9월호, p.109.
- 20 谢岳: 《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第165-168页。
- 21 [美] 查尔斯·蒂利: 《抗争政治》, 李义中译, 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第43页。
- 22 김병서, “한국 사회의 민주화와 기독교”, *한국사회발전과 기독교의 영향*, 서울: 한울출판사, 2000, p. 62.
- 23 이수연, “70년대의 반체제 목사들”, *신동아*, 1984년 9월호, p.184.
- 24 김명배, *해방 후 한국기독교운동사: 민주화와 인권운동을 중심으로 (1960-1987)*, 서울: 북코리아, 2009, p.177.
- 25 박양식, “구술사로 보는 새로운 역사: 현대한국사에서 기독교 민주인사의 역할을 중심으로”, *한국교회사학회지*, Vol.31, pp.173-206.
- 26 Cyris Moon et al, *A Korean Minjung Theology: An Old Testament Perspective*,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86, p.89.
- 27 이종오, “60-70년대 산업화 과정에서 사회구조의 변화와 사회운동”, *한국사회학*, Vol.19, pp.45-60.
- 28 김용복, “해방후의 교회와 국가”, *국가권력과 기독교*, 서울: 민중사, 1982, p.192.